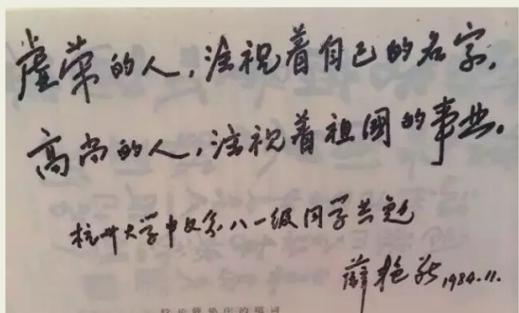


薛艳庄：从飞云江畔走出的杭大掌门人

■于平

立冬过后的杭州，暮云低垂，天地含悲。原杭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薛艳庄，这位从飞云江畔走出的大先生，与时代同频共行96载后，于2025年11月9日13时56分永远停止了思想。噩耗传来，人们匆匆从各地赶来，送别这位大先生。



少时的她曾险些失学

1930年，薛艳庄出生于莘塍薛里（今上望街道薛后村）。父亲薛祀光曾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后转任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她自幼在父亲言传身教的熏陶中成长，曾在薛里开启蒙学。优越的家庭背景本该让她享有安稳的童年，然而早年的她，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被迫四处逃难，使得薛艳庄没有机会好好读书。1945年，薛艳庄跟随父亲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高中，之后又在温州中学完成了高三的学业，辗转的生活让她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颠沛的经历也塑造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

薛艳庄的家中共有8个兄弟姐妹，1个哥哥，3个弟弟，3个妹妹。作为老二的她，早早扛起照顾家人的担子，买菜、洗衣、做饭、照顾姊妹，什么事她都会干。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在外赚钱。面对拮据的家庭经济，父亲曾无奈地对她说，“家里没有钱供你读私立大学了，如果你考上了公立大学，你就去读，如果考不上那就不读了。”

逆境没有阻挡薛艳庄求学的脚步，现实压力反而激发了她奋发图强的动力。她始终未放弃读书的信念，于是一边主动承担家务，一边刻苦学习，1948年她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生物系。1951年随院系调整，同济大学生物系并入正在筹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她由此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在校期间还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薛艳庄以优异的成绩，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在逆境中磨炼出的责任心与抗压能力，深深地影响她的人生之路。

四十年坚守，一辈子的杭大人

毕业后，薛艳庄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杭州大学生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她由此与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教师岗位上，她白天从事教学工作，晚上埋头研究课题，经常做实验到半夜，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薛艳庄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较早从事家鱼繁殖生理和同位素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开设《放射性同位素应用技术》《动物生理学》等专业课程，发表《西湖水域的生物学研究》《垂体注射对鲫鱼卵巢代谢的研究》等多篇论文。1960年，她对西湖水质和家鱼人工繁殖的研究工作获得了省政府嘉奖。

为编写适合新时期学生的教材，她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查阅国内外最新文献，常常工作到深夜。手指被纸张划出一道道细小的口子，眼镜度数一年深过一年。1983年，她主编的《教育学新论》出版，成为当时国内多所高校的指定教材。

如果按部就班，她很可能在学术道路上继续深耕，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1966至1969年间，薛艳庄被批为修正主义分子，被迫接受劳动改造。1970年初，结束劳动改造后的薛艳庄被安排到杭州大学教务处工作。尽管对失去教师身份感到遗憾，但她很快适应了行政工作。

工作勤恳，求真务实，为人低调，待人真诚，薛艳庄的工作很快得到大家的肯定，职务也随之提升。1958年起，薛艳庄任杭州大学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

教务处副处长，科研处处长，党委常委、副校长。1983年，在全国机构改革中，她被任命为杭州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1986年，她改任校党委书记至1992年。

作为一位从教师成长起来的大学校长，薛艳庄对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她十分重视教育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人文关怀。在担任杭州大学校长期间，薛艳庄面临教育资源有限的挑战，但她善于在有限的条件下挖掘潜力，推动学校发展。借建国30周年之机，她推动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全校科学讨论会，校外参会者超200人，大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这次全校性的科学讨论会促使大家深入思考如何创建自己的学科特色，极大地提振了师生信心，促进了科研成果井喷呈现，学校发展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

务实创新是薛艳庄教育理念的鲜明特点。她认为，教育既要脚踏实地，又要面向未来。在她的推动下，学校的学科建设迎来大发展，各院系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大胆拓展新学科领域，政治系发展为法律、经济、哲学、政治四个系，数学系增设统计与保险专业，物理系分出电子技术、计算机系，历史系则拓展出档案学、博物馆学等新兴方向，并推动建立理工科与人文社科的交叉研究平台，使学校在改革中保持活力。此外，学校还大力推动青年教师培养，为每位青年教师制定进修计划，要求他们必须参加科研工作与每周的读书报告会，给年轻人压担子，引导他们接触学科前沿。

在薛校长的主导下，学校还创造性地采用“校际交流”破局，利用汉语教学方面的优势，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等高校建立对等合作关系，派出比较拔尖、有潜力成为学科带头人的年轻教师出国交流，要求他们带课题出国进修，带合作科研项目回来。这种精准的派出机制，成效显著，派出去的年轻教师基本上都能逐步成为学术带头人。朴实无华、求真务实是薛艳庄的一贯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她的工作中，也体现在她的生活中。尽管职务不断提升，但她始终保持低调和谦逊，深受同事和学生的尊敬。

作为一所大学的领航者，面对当时有限的办学条件，面对改革重任，她没有退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迎难而上。在她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杭州大学在1998年与浙大合并之前，就已经成为当时省属地方大学中最优秀的大学。合并之后的浙江大学，更是全国100所211大学当中的一分子。1998年，杭州大学等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后，薛艳庄被任命为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任。面对这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改革，她以非凡的智慧与胸怀，致力于凝聚各方力量，推进浙大进入新的发展纪元。

她的贡献不仅限于教育领域。1988年至1998年，薛艳庄担任浙江省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从教育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舞台。在这一岗位上，她将其深耕教育数十载的经验与思考，融入对全省乃至全国社会发展的建言献策之中，继续为推动教育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她曾表示，“我也是杭大人，一辈子的杭大人！”这句话道出了她对教育、对杭州大学的深厚感情。正是这种对学校

的深情厚谊，驱使她为杭州大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薛艳庄是浙江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她在杭州大学工作了四十多年，亲历了从浙江师范学院到杭州大学的变迁，见证了杭州大学历史性发展的重要阶段。

浙江大学历史上，有两位女校长，薛艳庄便是其一。作为教育界的女性先驱，薛艳庄对女性的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她认为当代女性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她们细致、稳重、耐心，所以无论在什么职位上，女性都应该发挥自我，去创造一片新天地。

党代会上认识的人生伴侣

1960年，年届三十的薛艳庄与同为教师的何志均结为伉俪，组成教师之家。何志均是浙大计算机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计算机组成员，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学者，从事教育事业60年，先后在浙江大学创办无线系、计算机系，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电子学、计算机人才。浙江大学的两任校长潘云鹤、吴朝晖都是其学生。

1955年，省里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薛艳庄作为杭大的一名列席代表，何志均作为浙大的一名列席代表，他们在这次大会上认识。何志均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在浙大无线系教书，由于他们不在同一所学校，又都属于埋头于事业的人，平时彼此的联系也不是很多。最终在两所学校领导的撮合下结为秦晋之好。

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他们性格互补，薛艳庄性格开朗，爱好广泛，是家里的“一把手”，里里外外由她来担当；而何志均则喜欢独自钻研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内向的学者，他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虽然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却相濡以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共同走过了56年的风雨历程。

暮年捐千万积蓄做助学公益

2000年薛艳庄正式退休后，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她十分关心教育事业，关注教育公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农村教育资源均衡，不忘关心下一代，经常深入视察教育情况。2015年8月，93岁的何志均与86岁的薛艳庄拿出了他们毕生500万元的积蓄，发起成立了浙江云惠公益基金会，帮助杭州市以及浙江省内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为他们的子女在大学前教育阶段的求学提供支持帮助。

在基金会成立之初，曾有人建议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但遭到婉拒。得名“云惠”，意为“仁人云集，惠风和畅”，期待更多人能参与基金会，做强做大基金会。2016年，何教授辞世后，薛艳庄再次向基金会捐出500万元。作为工薪阶层，他们捐赠的金额，当然不能与富豪相比，但这近乎“裸捐”的1000万元，更显分殊玃、毫毫珍贵。

现在，斯人已驾鹤远行，大爱永留人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扫码看信

余思勉：一纸贡卷里的瑞安宿儒

■余盛强

1924年，直奉大战的战火波及瑞安城，街头巷尾皆是四处逃难的人群，时任瑞安公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的余思勉并没有带着家眷逃往繁华安稳的地方，而是安顿在瑞安乡间“大典学”——那个余氏家族世代扎根的故里。好友张桐在日记里简短地记下了这笔：“伊老父及女眷等均搬往大典下余建款家”，彼时谁也难以料想这个看似平常的避难选择，竟隐藏着清才与家族根系深沉的羁绊。

这位在地方志中仅留下“清末拔贡”“小学校长”寥寥数笔的余思勉，却曾是一位在清末科举“末班车”上夺魁的才子，一位与温州近代教育先驱陈献宸、孙诒让交往甚密的实干家。近日，一份宣统己酉科(1909年)的浙江选拔贡卷重现于世，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故事，才终于被层层剥开。

科举余晖里的“拔贡第一”

1909年秋天，44岁的余思勉站在了清代科举制度的终点线上。这一年，清廷举行宣统己酉科拔贡考试。这是自1905年科举废止后，为解决全国几十万生员出路的“善后之举”，成了清代拔贡考试的绝唱，亦属科举时代的“谢幕演出”。

拔贡，意为“向皇帝贡献的人才”，每十二年选拔一次，其难度远超如今的国考。考生需经各省学政层层筛选，再经过礼部朝考，合格者可直接授予七品京官或知县，是当时生员入仕的捷径。

当年，余思勉以县学学生的身份参与角逐，最终力压群雄，拿下瑞安县拔贡考试第一名。贡卷上“钦命浙江全省提学使司提学支取中批”“钦命陆军部侍郎浙江省巡抚部院增取中批”的朱红批阅，昭示着当年无比的荣耀。

按例，次年他需赴京参加甄录考试，《申报》也曾公布其录取名单。可惜命运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余思勉的仕途戛然而止。但塞翁失马，官袍未及加身的他，转身将毕生精力投入教育事业，开启了另一段传奇人生。

这份贡卷如同一份特别的“人事档案”，不仅收录了余思勉撰写的《始皇筑长城隋帝开运河功过比较论》《元世祖从卢世荣之言立规措所论》等多篇策论，字里行间皆是经世致用的才思。贡卷还记录了官方对他的评阅——第一场“独能自抒所见笔亦矫矫不群”，第二场“简峭廉厉推阐尽致”，第三场“议论切实笔意轩昂”。

难以割舍的文脉传承

贡卷清晰标注着余思勉的个人信息及家族脉络：余思勉，字洵芳，号松舫(又称“松舫”)，同治乙丑年(1865年)九月初四生于瑞安城西第五巷，为余氏迁瑞第十九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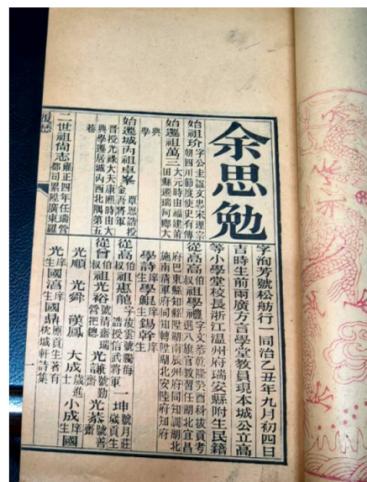
余思勉家族的迁徙史，可谓一部高度浓缩的瑞安文脉传承史。元代，始祖余万三从福建莆田迁居瑞安大典学；清康熙年间，第十二世祖余卓峰迁至县城西北隅第五巷，至此开启了城内余氏的兴盛篇章。余思勉所属的“商忠房”，是大典学余氏多个支系中文脉较为突出的一支，比如，著有《姓氏笺林》《文航漫录》的余学礼，著有《俗字编》的余国光，还有诗人余国鼎、余永森、余澜等。据余氏族人余建勋分析，余卓峰迁居城内前的祖宅，应该就在大典学祠堂南首的“九间”老宅，占地3亩，围墙高耸，前后门台气派，大门前还设有象征功名的旗杆架。更特别的是，老宅屋脊雕有“姓氏笺林”，这在瑞安沿海一带较为罕见，相传因家族自卓峰起至“国”字辈多为文官武将，以此彰显身份。

令人惋惜的是，“九间”老宅在20多年前已被悉数拆除，如今余氏宗祠的前院与道路，正是昔日余思勉祖居的遗址。而族谱中一段小小的“断档”，更添几分对历史的唏嘘。由于古时交通不便、信息阻隔，族谱在迁瑞第六代后便全然没了余思勉父亲余瀛彬及后人的记载，城里余氏后裔亦多次寻访一无所获，幸得这份贡卷，才有了将这段家族史重新续接的希望。

新式教育的薪火相传

余思勉的教育生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他的授业恩师名单里，既有像朱彝甫这样的传统学者，也有陈献宸这般开风气之先的近代思想家和教育家。1906年，应恩师陈献宸之邀，他远赴广州，在两广方言学堂担任讲习——这所由粤秀书院、两广学务处、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复改而成的学堂，是广州最早的外国语高等学校，教授英语、法语及国际交涉知识等，堪称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

在两广方言学堂的历练，让余思勉的教育视野得以极大拓展。他与同为瑞安籍的教师唐闾结下深厚友谊，两人日后共同倡议成立了瑞安通俗图书馆。余思勉回到家乡后，1919年任职于瑞安官立高等小学堂(瑞安市实验小学前身)，并于1921年出



任校长。彼时，学校校舍仍是科举时代的旧考棚，阴暗局促，极不利于新式教育的推行。余思勉大刀阔斧，将考棚悉数改建为“光明轩”的讲堂，还牵头成立县小学教育研究会，聘请优秀教师，让学堂里的琅琅书声，成为瑞安城里最动人的新声。

1926年，余思勉做出了一件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他力排众议，将校内文昌阁改建为“籀公楼”，以纪念学堂创始人、近代教育家、经学大师孙诒让。亲自筹措资金，参与设计，楼内不仅悬挂孙诒让画像，还设专橱陈列教育文献。项骧、池志激、胡调元、张桐等文化名流纷纷为其撰联，其中项骧“玉海飞云，杰地自收风月景；籀楼拱瑞，书山多植栋梁材”的诗句，至今仍存瑞安教育界流传。

除了办学，余思勉对地方文化事业同样倾注心力。1902年，他曾加入孙诒让发起的瑞安演说会，在明伦堂宣讲新知。1925年，针对公立图书馆“藏书多系专门书籍，平民苦无书可阅”的现状，他与唐闾等人筹组通俗图书馆，让文化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张桐日记里的师友知己

如果说贡卷勾勒了余思勉的人生骨架，那么张桐的日记，则为这副骨架填充了血肉。在张桐的笔下，余思勉永远是“松舫兄”——即便他比余思勉大5岁，在私人日记里，也从未直呼其名。这份尊敬，源于对其才气与人品的深深折服。

两人的交集，早已超越普通朋友。张桐的三舅父李毓芳是余思勉的授业师，1892年余思勉在张桐叔叔的爱日楼设私塾时，张桐的从弟琳曾拜其为师；1919年，张桐的幼子张崑入读高等小学，三年间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深得余思勉赏识，他曾对张桐感叹：“崑儿品学为一校之冠，宜善培植之。”

日记里的片段，还原了两位知识分子的精神共鸣。1895年春，两人拜访池志激，“余以久阔晤谈，与纵论天下变故，茶罢始返。”1902年，招商局海轮从上海带回《新民丛报》《中外日报》，余思勉第一时间跑到张桐家，两人对着新书报“赞叹不置”；1921年，他们在校长室“纵谈近日人心风俗之坏，太息者久之”。1926年，张桐登上刚建成的籀公楼，大为赞叹，而后在给余思勉的信中写道：“四面开窗，光明直达，真可先哲神明，肃诸生瞻拜。”

1927年9月，瑞安爆发时疫，余思勉不幸染病逝世。张桐在日记里写下“老友余松舫已染疫逝世”，寥寥数字字字掩悲痛。他不仅写下“而今但踏春城路，桃李垂街尽泪流”的挽联，还特意乘船赴瑞安太平石街余家吊丧。一别成永别。这段跨越二十余年真挚的友谊，最终以一场悲怆的告别谢幕。

从大典学的九间祖宅到瑞安城第五巷，从清末的拔贡才子到近代的教育实干家，余思勉的一生，正如那份缓缓铺开来的拔贡卷，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写满了对文脉的坚守与对教育的赤诚。而1924年那场战火风波中的归途，则预示了他与故土、与人生、与文化教育的深厚交织。